

三星堆器物上的“图语”和“图画文字”及其源流考

段树乔¹, 武莉²

¹ 云南大学软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云南昆明

²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昆明

【摘要】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上有丰富多彩的图纹，这些图纹并非用于艺术装饰，而是具有特定寓意的“图语”和“图画文字”，它们又与器物本身的“物语”相配合，表达了“三星堆人”的祭祀目的和意志。通过用古彝文解读，考释出了这些“图语”和“图画文字”所寓意的含义，它们是“三星堆人”想通过祭祀来禳除地震和洪涝灾害所要表达的语言和文字。从比较材料来看，这类“图语”与“图画文字”与新石器时代以来多地祭祀遗存中的灾害象征图式具有连续性，体现了早期华夏族群对自然灾害的长期认知传统。

【关键词】三星堆器物；祭祀；图语；图画文字；溯源

【收稿日期】2026年1月4日

【出刊日期】2026年2月5日

【DOI】10.12208/j.ssr.20260045

A study on the picture languages and graphic texts on Sanxingdui artifacts and trace to the source

Shuqiao Duan¹, Li Wu²

¹Yunnan University Soft Science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Kunming, Yunnan

²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The artifacts unearthed at Sanxingdui sacrificial pits have colorful patterns. These patterns are not used for artistic decoration, but have a specific meaning of "picture language" and "graphic text", they also cooperate with the "object implied language" of the objects themselves, expressing the sacrificial purpose and will of the "Sanxingdui people". Through using ancient Yi characters to interpret, the implied meaning of these "picture languages" and "graphic texts" is explained, they are the language and writing that "Sanxingdui people" want to express by offering sacrifices to get rid of earthquake and flood disasters. From the comparative materials,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kind of "picture Language" and "graphic Text" have continuity with the disaster symbol patterns in the sacrificial remains of many places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reflecting the long-term cognitive tradition of the early Huaxia ethnic group towards natural disasters.

【Keywords】 Sanxingdui artifact; Sacrifice; Picture language; Graphic text; Trace to the source

1 前言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迄今已经发掘出了1号至8号祭祀坑，丰富的出土文物让世人惊叹，特别是那些造型威严神圣的面具、典重庄严的青铜大立人像、神秘诡谲的神坛和顶尊人像，可谓“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关于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八号坑发掘简报》已经定性为“祭祀器物掩埋坑”^[1]，再次肯定了《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的结论，而且是“‘三星堆人’为祈求力量，战胜地震和洪涝灾害的祭祀活动后的掩埋坑。”^[2]这种定性也已经从部分出土的青铜器物上的“图语”

和“图画文字”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物上的图纹丰富多彩，所隐含的文化博大精深，尽管笔者从彝族的历史文化视角解读出了一部分^[2]，但只是“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目前，学者们对三星堆出土器物上的图纹研究几乎都停留在装饰艺术层面上，如：《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认为龙虎尊（K1:258）腹部上的图纹是“饕餮纹”^[3]，《三号坑发掘简报》认为顶尊跪坐人像（K3QW:26）、神坛（K3QW:13）等的图纹是“兽面纹”^[1]。《2号祭祀坑发掘简报》认为：“这些器物上多饰双层花纹和三

作者简介：段树乔（1961-）男，彝族，云南省系统工程学会高级工程师，云南大学软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系统工程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武莉（2000-）女，彝族，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语言、文化研究。

层复合花纹,一般以云雷纹衬地,突出主体双夔组合成的饕餮纹。”^[4]龚新源和申子嫣两位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上的许多纹饰风格,运用了大量的兽面纹、云雷纹、夔龙纹、涡纹等来装饰,其无论是平面纹饰类,还是造型类纹饰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财富,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艺术宝库。”^[5]毫无疑问,青铜器饕餮纹或兽面纹,以及通身满饰精美绝伦的纹饰,是三星堆青铜器装饰艺术的佳作。不过,他们没有对这些艺术性图纹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学者江伊莉的研究进了一步,提出了殷商时期的器物上的纹饰是“宗教纹饰,蕴含着商王变形力量的象征。”^[6]杨晓能先生认为:“兽面纹是商代神权政治的象征。”^[7]学者郭秀也认为:“商周时期统治者用青铜器纹饰的‘狰狞恐怖’来表达王权的‘神秘威严’,以达到其对政治权利、地位与财富的占用。”^[8]

显然,学者们对三星堆(包括殷商)出土的青铜器物上图纹的认识,数十年来一直都在不断地探索和认知之中,尽管有了“宗教纹饰”、“统治者的变形力量”和“神权政治象征”的观点,但是对于三星堆出土的这些祭祀器物来说,其上的图纹并非为权力的象征(如果是商王朝权力的象征,两个对立分治的王朝不可能同样的图纹出现在三星堆),而是祖先神、日月神和自然灾害的威力象征^[2]。其实,三星堆器物上的图纹是“图语”和“图画文字”,其与“物语”相

配合,表达了“三星堆人”的祭祀愿望。这里所称“图语”,指虽无固定语音(表音)却具有稳定语义(表意)指向的象征性图像;“图画文字”则指代表语言中的词、可与特定语义单位对应,并在不同器物上重复出现的图形符号;而“物语”则是指器物整体在祭祀、卜卦行为中所发挥的语义功能。三星堆器物上的“饕餮纹”或“兽面纹”和许许多多的图纹与“三星堆人”祭祀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们以前没有读懂这些“图语”和“图画文字”,正是迄今为止无法解开三星堆之谜的关键所在。然而,中华民族从可考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柿子滩岩画^[9]开始,“图语”和“图画文字”就已经成为了沟通与交流人类思想的重要途径。实际上,三星堆青铜器物上的图纹不仅有“图语”,而且有“图画文字”。三星堆文化没有“文字”是以“与甲骨文形体结构相对应”或“单体类的符号不能组字成词组或句子”作为判别标准来判定的。众所周知,早期古“文字”是以单个字符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要以用途和载体为标准来判读,不能与甲骨文形体结构相对应,而且即使一样的象形符号,其“义”也不一样,不能因形生义。如果从民族学的视角来讲,三星堆器物上是有许多“图语”和“图画文字”的,这些“图语”和“图画文字”并与器物本身的“物语”构成了“三星堆人”用以表达祭祀目的和愿望的叙述性记录。



图1 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首三虎图”(《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截图)

2 青铜器物上的“图语”和“图画文字”

2.1 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龙虎尊腹部图纹及其“图语”和“图画文字”

一号祭祀坑提取有一“龙虎尊(K1:258)”^[3],其

腹部有一图纹,本文命名为“一首三虎图”如图1所示。图纹主题由“一首三虎”和古彝文字“𠄎”、“𠄎”的“图画文字”组成。古彝文字“𠄎”现在一般指地名“红河”^[10],但其原始字义为“红色的

河”、“卷浪”和“山洪”之意,《易纬是类谋》有:“黄帝世,……名水赤,大鱼出,斗拔纪,天下亡。”说明“水赤”与“天下亡”的内在关系,“三星堆人”也已经懂得了这种文化。

符号“𠄎”由古彝文字“𠄎”、“𠄎”和“𠄎”构成,“𠄎”为“猛兽”、“水怪”之意^{[10]250},“𠄎”为“抖”、“颠”、“震”之意^{[10]371}。整幅图案可释义为“洪水猛兽、地动山摇,席卷一空。”^[2]

在彝族文化中,虎称之为[lɔ:],河流形成的旋涡和龙潭出水的状态称为[yi: lɔ:],即“水中之虎”,有谚语“小心河中虎,旋涡吞噬人。”因而常以山河与虎类比。而且,龙虎尊(K1:258)腹部的“一首三虎”图纹构成“T”字形,这也是古彝文字“上”的“图画文字”,释义为“汇、聚、冲、闯”^{[10]239-240},其强化了祭祀对象“洪水猛兽”的疯狂程度。

虎头的两只耳朵又由古彝文字“𠄎”的“图画文字”和一对天龙“𠄎”、“𠄎”符号组成,古彝文字“𠄎”为“祭祀”之意^{[10]195},一对天龙“𠄎”、“𠄎”在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中描述为“金龙神”和“银龙神”(或太阳神或月亮神),释义为“祈求金龙神和银龙神来制服洪水猛兽,保黎民百姓平安。”

“龙虎尊”腹部的图纹尽管突出了“一首三虎”和古彝文字“𠄎”、“𠄎”的“图画文字”,以强调洪灾的凶猛程度,而表达祭祀祈求金龙神和银龙神来制服洪水猛兽的意图部分较小,但以站位于“虎头、虎耳”的要害部位优势,表达了“三星堆人”对天神的虔诚和战胜“洪水猛兽”必胜的决心。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说,曰“一条龙头虎身的怪兽窳窳凶神恶煞,躲在弱水中,兴风作浪,由此产生地壳变化(地震),浑水横溢,水患无穷,民不聊生。”于是先秦孟轲《孟子·滕文公下》有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显然把洪水比作了猛兽,而且从传说中描绘了“洪水猛兽”与地震的关系。从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龙虎尊”上的“一首三虎”图纹来看,“三星堆人”所举行的“禳除地震和洪涝灾害”的祭祀活动中的“洪水猛兽”与中原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就是中国古代民间关于“洪水猛兽”典故来源的考古学证据。学者陈显丹认为:“龙虎尊(K1-158)上的龙和虎都做成一首两身,这与古代君王‘残民以事神’思想的具体表现有关。”^[11]笔者认为“双虎食人”的“图语”应为“吞食人的洪水猛兽”,而非“残民以事神”。

安徽阜南也发现一件殷商时代的“龙虎尊”,其

“下部有三个虎头突出在器的腹部,张面露齿,作食人状,刻镂古朴生动,细致精美。”^[12]石志廉先生认为这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阶级对立的实物例证^[13]。显然,石志廉先生没有理解与食人虎相配的或同文化青铜器上的“𠄎”、“𠄎”和“𠄎”图纹的含义,认为这些图符是“作陪衬”的纹饰。其实这件“龙虎尊”和其它青铜器也与三星堆的“龙虎尊”、青铜器一样都是用来“禳除水灾”的祭祀器物,图纹所表现的也是“洪水猛兽”,这与阜南的地理环境(在淮河、润河、颍河冲积地带)和历史上深受洪灾的情况相吻合,《安徽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发掘简报》足以说明古代阜南地区洪灾的严重性。

2.2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八鸟四牛铜尊”图纹及其“图语”和“图画文字”

1986年8月20日至9月17日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一件“八鸟四牛尊”(K2②:146)^[4],其上有复杂的图纹(如图2所示,纹饰拓片1/4)。



图2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八鸟四牛铜尊”图纹
(《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截图)

这幅图纹有六个古彝文字,现将与《滇南彝文字典》^[10]对照释义列表1之中。

“八鸟四牛尊”图纹从上至下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应为“牛头虎身”兽面纹,《山海经·东山经》有载:“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虎文,其音如钦。其名曰軫軫,其鸣自訖,见则天下大水。”毫无疑问,该图纹是《山海经》所载的“猛兽与水灾”的可考依据,其把古蜀洪灾与“牛

头虎身”怪兽联系起来,表达了“三星堆人”对洪灾的恐惧。这部分图纹通过用“𠄎”来点缀怪兽的角、眼睛、鼻子,用“𠄎”来修饰牛身,进一步强化了“洪水猛兽”的威力。

第二层次由四个古彝文字“𠄎”、“𠄎”、“上”

和“𠄎”的“图画文字”构图,突出了“三星堆人”的祭祀对象“水妖”,表现出了祭祀的目的。

第三层次由三个古彝文字“𠄎”、“𠄎”和“上”的“图画文字”组成,寓意为祭师有“禳除地震和水灾”的能力,树立民众对祭祀的信心。

表1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八鸟四牛铜尊”上的“图画文字”与《滇南彝文字典》^[10]对照释读表

图画文字	古彝文字	彝文释义	页码
	𠄎	“红河”、“赤水”、“卷浪”、“旋涡”,在彝族文化中,山河爆发,河水变红,万劫不复。“八鸟四牛铜尊”牛鼻子、角和眼睛处的“图画文字”是“𠄎”的异体字或艺术字,表现出了其凶猛的程度。	第 172 页
	𠄎	“祭”,用以表示“祭祀”,在彝族文化中,凡与祭祀相关的活动、场所、器物都会有这个字符。	第 195 页
	𠄎	“妖精”,与牛眼和其他部位上的“𠄎”“图画文字”相配合,释义为“水怪”或“水妖”。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K3QW:26)上也有这个“图画文字”。所以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八鸟四牛铜尊”(K2②:146)、铜尊(K2②:147)和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K3QW:26)可以称之为“祭祀水妖的铜尊”。	第 319-320 页
	𠄎	“祭师”、“圣人”,指主持社祭活动的祭师,在彝族文化里不包括超度亡灵的法师和为病人驱鬼和招魂的巫师。祭师头部两侧有“𠄎”的“图画文字”,表明了祭祀的重要性。	第 12 页
	𠄎	“干涸”、“退水”,以表达“三星堆人”祭祀禳灾的目的和愿望。	第 63 页
	上	“赢”、“胜”,其位于祭师手臂下两侧,以表达祭师通过祭祀完全可以赢得“禳除地震和水灾”的胜利,以此来树立民众对祭祀的信心。	第 154 页

整幅“八鸟四牛铜尊”图纹可以解读为:“洪水猛兽即将来临,要祭祀水妖,通过祭祀完全可以让洪水退去。”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青铜器窖藏坑出土的“牛首饕餮纹铜尊”^[14],其牛鼻用“𠄎”修饰,并有“𠄎”“图画文字”配图,显然也是用来祭祀洪灾的铜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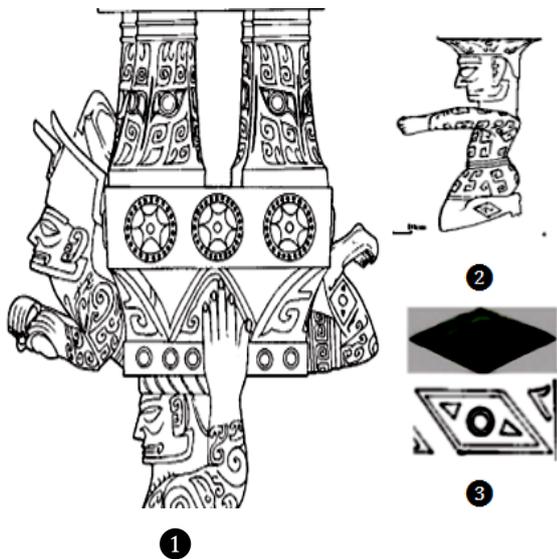
2.3 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图语”及其“图画文字”

2021年1月至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上海大学对三号坑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青铜大口尊(K3QW:1、K3QW:18、K3QW:578)、青铜顶尊跪坐人像(K3QW:26)、青铜神坛(K3QW:13)、星形符咒(眼形器K3QW:125)等众多器物^[15],在这些器物上面有着丰富的“图语”和“图画文字”,除了在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上出现的“图画文字”以外,

还有青铜神坛(K3QW:13)上的“𠄎”、“𠄎”、“𠄎”、“𠄎”、“𠄎”、“𠄎”(如图3所示①)和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上的“𠄎”、“𠄎”(如图4所示①)六个“图画文字”,表2是这六个字符与《滇南彝文字典》^[10]和《简明彝汉字典》^[16]对照释义表。

从表2中的六个字符解读来看,三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也都与地震和洪灾有关,反映出了“三星堆人”深受地震和洪涝灾害,祈求天神(日月神)派天上的天龙(金龙神和银龙神)来战胜灾害的诉求。特别是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祈求者身穿以“𠄎”的“图画文字”为主题的祀服和脚上带着星形符咒(图3②所示),表达了人间“天旋地转,洪水滔滔,大地一片汪洋”的惨景,尊顶上三只天龙从天而降,以征服洪水猛兽。青铜神坛则以“高耸入云”的艺术造型,表达了人们对天神的敬重。图4①中有②③两组“图画文字”,其以祭祀

的“”文字符为主题构图, 把“”、“”两个字符融入在其中, 表达了“三星堆人”对天地之神灵的虔诚。



①青铜神坛; ②青铜顶尊跪坐人像; ③星形符咒

图3 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坛、跪坐人像及星形符咒图纹和“图画文字”局部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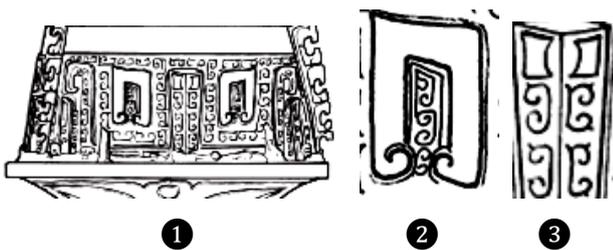


图4 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局部截图

由于二号、三号、七号和八号祭祀坑有器物相混的情况, 因此这些坑之间具有较强的共时性关系^[1]。笔者已经考释出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石边璋”和青铜大型立人像, 并提出了“石边璋”是针对地震和洪灾来临之际的一次意义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使用的法器, 其以“图语”和“图化文字”的形式, 记叙和回答了“三星堆人”为什么要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的初衷^[2]。毋庸置疑, 三号、七号、八号坑、包括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各种祭祀器物都是紧紧围绕着“石边璋”上的“祭祀情景”制作的。在这盛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中,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是表达“三星堆人”对天神的虔诚, 神坛、神树是人们与日月神、天神联系的“通道”, 青铜大型立人像是“三星堆人”想借以具有“盖起乾坤”超凡能力的轩辕氏与天神沟通, 神鸟是实现“天人合一”的使者, 天上的天龙要通过神坛、神树、大型立人像手中的“通道”才能来

到人间为黎庶大众消灾解厄。

这里想提一下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人像最顶层人像手心握着一根“管道”, 天龙从天空穿其而过。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坛附属立姿人像, 则神鸟从手心飞向天空。显然, 体现了圣人手心是具有“沟通天地的管道功能”^[17]。但是, 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是“三星堆人”的始祖“轩辕黄帝”, 其具有总览乾坤的超凡能力和天命威严, 与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人像和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坛附属立姿人像所彰显的圣人不同, 穿过其手心的是能量无比的雷电。

2.4 七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铃上的“图语”及其“图画文字”

2020年12月至2022年11月,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七号坑, 出土一件完整的青铜铃(K7QW-T-100)^[18], 如图5所示。《发掘简报》描述为: “铃身饰兽面纹饰, 宽眉, 圆眼, 露齿, 尖牙。”实际上, 这件铜铃上的图纹有丰富的“图语”和“图画文字”。



图5 7号祭祀坑出来的铜铃“图画文字”

两侧的卷云状翼是彝族文化中的“金龙神”和“银龙神”, 因而这件铜铃的“物语”可释为“金龙神和银龙神摇动着铜铃来驱除洪水猛兽”, 或者说“这是一件借助于金龙神和银龙神的威力来驱除洪水猛兽的法铃。”

铜铃内有复杂的图纹, 总体来看是由古彝文字“”“铃”^{[10]198}的“图画文字”构成, “兽”的眼睛由“星形符咒”和古彝文字“”组成, 释义为“诅咒洪荒, 或“禳除水患”。下内还有一个“图画文字”, 即“涨水”的古彝文字“”^{[10]257}, 或古彝文意为“跌撞”“碰撞”的“”异体字^{[10]113}, 这个“图画文字”的左右又各有6个古彝文字“”, 释义为“湖”、“海”、“洋”^{[10]444}, “”和“”组成彝语“洪水滔天”。整个图纹的“图画文字”释义为: “金龙神和银龙神, 摇响铜铃禳除水患。”

表2 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器物上的“图画文字”与古彝文字^[10,16]对照释义表

图画文字	古彝文字	彝文释义	页码
		“封”、“封祀”、“封禪”，祭天叫封，祭地叫禪，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典礼。“三星堆人”在青铜神坛最醒目的位置铸上十个“  ”字，表现出了他们强烈的祭天愿望，也说明了青铜神坛是祭天的器物。这里也可能指神坛中“一头戴方帽人像以俯卧的姿态横穿方形平台下半部” ^[15] 的人，在彝族文化中主宰大地的八方之神，叫[ʃe]，彝文为“  ”，这里表示地神对天神的虔诚。	《滇南彝文字典》第 67 页《滇南彝文字典》第 426 页
		“治”、“治水”，这个“图画文字”在俯卧人像的帽子上，表示主宰大地的八方之神，全力以赴，以最大的诚意背负起祀天的高大铜尊请求天神降临人间禳除水灾的愿望。	《简明彝汉字典》第 160 页
		“洋”、“湖”、“海”、“汪洋”，这里特指“水患”这个字符出现在神坛的俯卧人身下、小腿上和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的小腿上，寓意“身下、脚下一片汪洋”。	《滇南彝文字典》第 444 页
		“咒”、“水怪”、“猛兽”，图 3 中  是一个护身符咒（《发掘简报》称“眼形器”K3QW:125、K8@TQ:306），这个图纹在三号坑的青铜神坛附属立姿人像站台侧面、青铜神坛主体（K3QW:13）俯卧人的小腿上、青铜顶尊跪坐人像（K3QW:26）跪坐人的小腿上和八号坑的“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的跪坐人小腿上都有。这个护身符咒上的“图语”由“  ”和“  ”两个古彝文字组成，其中“  ”为“咒”，宗教或巫术中用以除灾或降祸的口诀。反咒，彝族的一种宗教仪式。其与“  ”配合使用，寓意为“咒水怪”“祛除水患”。水灾是“三星堆人”最恐惧的灾害，他们制作这种护身符咒带在身上，以咒祛蠹。	《滇南彝文字典》第 250 页
		这个“图画文字”由“  ”和“  ”两个古彝文字组成，其中“  ”为“乾坤”，释义为“祭祀乾坤”或“祭祀天地”。	《滇南彝文字典》第 115 页
		这个“图画文字”由“  ”和“  ”两个古彝文字组成，其中“  ”为“神灵”，释义为“祭祀神灵”，因“跪坐的人像”身穿带有“  ”“图画文字”的祀服，所以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也是用以禳除地震和水灾的法器。	《简明彝汉字典》第 88 页

众所周知，铜铃最早出土于公元前 2400-1800 年的陶寺遗址，它是由陶铃发展而来的，有学者认为“它是作为佩带在人腰部的饰物。”^[19]也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人身份的象征物，是一种特殊权威物品。”^[20]其实，陶寺遗址处于黄河和汾河的冲击地带，除了水患以外，还有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捕鱼、过河，水患和溺水是“陶寺人”最恐惧、最有可能的灾难，人们将其系在腰间是为了避邪、避水患、避溺水。

一千多年以后的“三星堆人”，地震和洪荒成为了他们最恐惧的灾害，铃成为了祭祀禳灾过程中的重要法器，正如王继超先生所说：“在彝族宗教观念中，铜铃是天降之威力无比的法宝，也是宗神威势和族权的象征。”^[21]三星堆 7 号祭祀坑出土铜铃 46 件，挂架 22 件，说明这些铜铃在祭祀时组成一个“铃阵”，通过摇动来发音的法器。人们通过叮当作响的铃声来向祖先神和日月神发出人间的祈求信号，祖先神和日月神听

后会降临人间以镇山川，驱除邪恶和水患，铜铃的这种功用可从 2 号祭祀坑中出土的刻有祭祀情景以镇山川的“石边璋”、总览乾坤的轩辕氏大型青铜立人像和 7 号祭祀坑出土的用来消除地震的法器“龟背形网状青铜器”^[2]足以说明。

3 “图语”和“图画文字”源流

三星堆 1-8 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上的“图语”和“图画文字”所反映的文化元素主要有地震、洪水、祭祀、日月神（金龙神和银龙神）、神鸟和祖先神，其中洪水“”、地震“”、祭祀“”、封祀“”、汪洋“”和诅咒“”是三星堆文化“图画文字”的主要字符，也是三星堆文化最早的文化来源指向，这六个古彝文字，过去通常被称之为涡纹、云雷纹、龙纹、星纹、圆纹和三角纹。

从目前考古所获得的成果来看，“图语”和“图画文字”最早出现在距今 1.5 万年左右的晋南柿子滩岩

画, 其上有三个古彝文字“𠄎” (鹿)^{[10]310}、“𠄎” (破出、劈开)^{[10]382}和“𠄎” (古彝文字“𠄎” (王)^{[10]336}的女性化“图画文字”, 指女祖、女王) 字符, 可用彝族文化解读为“女祖生子送子图”^[22], 也许是三星堆“图语”和“图画文字”的源头。

2015年5-8月,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对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出土一件带有“◎”刻纹的残骨 (F1:1) (如图6所示)^[23]。2020至2022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又对四台遗址再次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 认为四台第一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10400至10000年, 第二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9200至9000年^[24]。Dandan Wang等学者也提出了“华北地区全新世期间年平均降水量变化很大, 最大降水量520毫米发生在9500-5020 cal.yr BP期间, 比现在高出约20%。”^[25]和“华北新石器时代平原地区洪泛频繁”^[26]的研究成果。因此, 四台遗址当时深受洪水冲击, 盆地汪洋一片, 水灾成为了人们最为恐惧的自然灾害, 残骨所带的“◎”刻纹应为古彝文字“海洋”、“汪洋”、“湖泊”或“被洪水冲击”之意, 引申义为“水淹”和“水灾”, 这件刻纹的残骨是“禳除水灾祈福”的骨饰, 这可能是有“图画文字”“◎”最早的地下出土文物, 说明华夏民族早在9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用以表达水灾的“文字”。



图6 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刻纹骨饰

贾湖遗址出土的H190:2AIII卷沿罐的口沿下有一陶符“☀”^[27], 其为古彝文字“𠄎”的原始字符, 可解读为“明亮”或“光明”^{[10]415}, 在彝族文化里指“光芒四射的太阳神”, 显然是三星堆文化中太阳神的“物语”及其“图画文字”的源头^[28]。

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来的泥塑陶人头像^[29]应为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鼻祖, 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三足乳钉纹陶鼎 (M56:2)^[30]上的“乳钉”, 就是最早的“符咒”的实物, 是字符“▷”的物化形式。贾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护身符咒 (H282:2)^[31]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护身符咒 (K3QW:125)^[15]形制相同, 是三星堆“图画文字”“▷”的源

头。贾湖遗址M55号墓葬出土的象牙雕板^[32], 其造型是华夏古彝文字“鹇”的“𠄎”的原始字符^{[10]246}, 释义为“让亡灵乘白鹇回归祖地”, 证明“贾湖人”也视白鹇为神鸟。在彝族文化里, 白鹇是祖先喂养的神鸟, 三星堆8号祭祀坑出土的凤鸟 (K8⑨TQ:530) 就是白鹇, 所以三星堆文化、彝族文化与贾湖文化一脉相承^[22]。

在距三星堆文化4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474个祭祀灰坑遗迹, 这就是三星堆文化“祭祀——燔燎——捣毁——瘞埋”祭祀方式的源头^[28]。

在距今约7800~7100年的湖南洪江市高庙文化早期遗存中部分陶器上出现了有附有“双翅的獠牙兽面”、“载托太阳或八角星”翱翔中天的神灵崇拜图纹, 而且在其文化遗址发现了有大型的祭祀场所^[33,34,35] (如图7所示)。

高庙文化图7中①的“双翅獠牙兽面 (T1015⑧:16)”可以说是考古学意义上最早的兽面纹, 其上下左右有四个“𠄎”的“图画文字”, 应为古彝文字“守”、“护”之意^{[10]433}, 也就是说, 这个“双翅獠牙兽面”是“高庙人”的守护神。从下横有波浪纹和口、翅膀用古彝文字“回”表述的情况来看, 它是一个降水妖伏洪魔的守护神, 四只獠牙如同象牙一般, 祛除洪水猛兽, 保人民一方平安, 这就是三星堆象牙文化的滥觞。

“载日”鸟纹 (M41:1) 并非鸟“载日”, 而是“鹰鸟载鱼祀天” (鱼有胡须), 其上的八角星为“封”的古彝文字“𠄎”, 即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坛上的“图画文字”。

图7中②由上下两层图纹组成, 上层为内含“𠄎”的“图画文字”的八角星图纹, “八角星”是由“○”和八个“▷”字符组成, 其中“○”古彝文字义为“鬼”、“魂”、“大象”^{[10]345-346}, 这里指力大无穷的“大象”, 在彝族文化里大象是守护神; “▷”为古彝文字“咒”、“水怪”、“猛兽”之意^{[10]250}, 这里应为“咒”; “八”彝语为[hi:]与“强大”、“威力”同音, 通常假借, 所以在彝族文化里“八角星”的“图语”寓意为“诅咒的魔法威力无比”, 其内含“𠄎”字符, 就是彰显“高庙人”的“守护能力”。

下层有三个“星形符咒”, 其由“◎”和“▷”的“图画文字”为元素构成, 这个符号在三星堆三号和八号祭祀坑均有出土 (图3③), 其寓意和功用前面已述, 这里不再赘述。罐上刻画“星形符咒”具有“求福禳灾”的功用。

图7中③有两个星形“图画文字” (T10-02和T1115⑩:77), 分别为古彝文字“𠄎”和“𠄎”。“𠄎”

意为“封”，即“祭天”；后一个由“◎”、“✕”字符和两层间断圆圈组成，特指洪水泛滥形成的汪洋。

“✕”为“开”、“涨水”^{[10]267}，说明“高庙人”深受水灾之苦。高庙文化遗址中有一个分布面积达 1000 平方米、祭祀设施（包括祭坛、祭祀坑、祭祀活动相关的房址、储藏祭品等）齐全的祭祀中心。《发掘简报》认为陶罐（T1115④:77）上的图纹可能是祭祀遗址原始的构筑物摹写，其上有土台和大象（如图 7 中③右图部分），这里的土台和大象有三个方面的功用：第一，“土克水”；第二，雄伟高大的土台可挡“洪水猛兽”，以镇水患。土台上面“◎”的“图画文字”也说明土

台的“镇水患”功能；第三，大象与“水”相克，是水妖的天敌，便成为了“高庙人”的守护神。“高庙遗址中大型祭祀场面向河流并按南北中轴线布局的结构”^[35]也说明了这是一个禳除水灾的祭祀场所，与此同时也说明了早在高庙文化时期，中华“五行”传统文化就已见其雏形，这是最好的物证。在三星堆文化里则体现为“以天龙克地之水患，以沉象齿杀渊中水妖。”其与高庙文化一脉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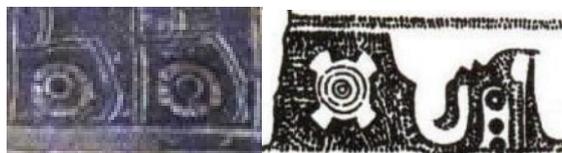
显然，三星堆文化有源自高庙文化的元素，由于两个文化相距 4000 多年，他们之间具体如何传播尚需进一步考证。



① 陶罐兽面纹和“载日”鸟纹



② 罐上的刻划八角星及其它图纹



③ 陶罐图纹

图 7 高庙文化“图语”和“图画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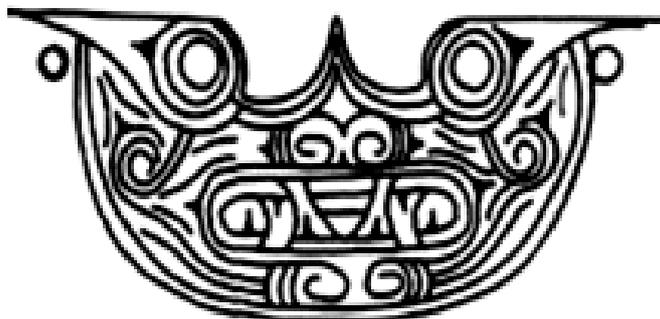


图8 瑶山 (M4: 34) 墓地出土的玉璜图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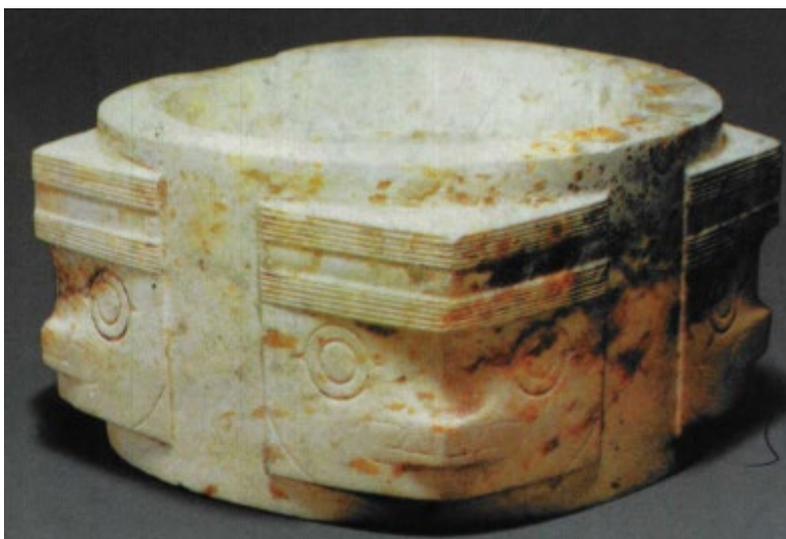


图9 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玉琮（《文物》1997年第7期封面截图）

高庙文化不见“”、“”和“”的“图画文字”。到了距今 5500-4000 年之间的良渚文化^[36]则有了这种“图画文字”的雏形，如图 8 所示是瑶山 (M4:34) 墓地出土的玉璜图纹^[37]，由于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中墓地与祭坛同在一个位置^[38]，从墓葬中出土的玉质礼器上的图纹，明显反映了祭祀文化的内涵。其也许是“良渚人”也遭受了洪涝灾害，把洪灾比作了洪水猛兽，并制作出相应的祛灾符咒，让人们佩戴以消灾祈福。良渚文化中用“琮”相当普遍，而且其上有兽面神，有表示“洋、湖、池”的古彝文字“”（如图 9 所示），说明“良渚人”用玉琮作为祭祀的神器，以祛水患。张明华等团队也通过发掘上海江海遗址后，经研究提出了“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主因是大雨引起江河泛滥的特大水灾”^[39]的结论，并认为良渚文化象征物玉琮在中国各地的出现是“当年良渚人在洪水猛兽的肆虐下，慌不择路，四处逃遁的轨迹。”^[39]显而易见，良渚文化开始出现了洪水“”、“”和祭

祀“”文字的端倪。与此同时，良渚文化也出现了“神人兽面”，其标志着华夏民族“洪水猛兽”文化的形成。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一件象牙器 (M6:36)，其上清晰地显示出一组繁复的兽面纹，刻工极为精细^[40]。这件象牙器应为护身符，其与大汶口文化的象牙梳、象牙琮、象牙雕筒一样具有“驱妖降魔，消灾解厄”的功用。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象牙雕筒是其墓主有特殊社会地位的富有者的象征。”^[41]但从其上有“”的“图画文字”来看，是用于避邪驱鬼的符咒。因此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具有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关系（也不排除在洪水猛兽面前逃亡到了大汶口文化区的可能性），就像吴汝祚先生所说的“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出现的象牙器，应是在良渚文化影响下而产生的。”^[42]我们以此可以推断三星堆的象牙文化可能也源自良渚文化，这种情况也可以从“良渚文化居民是太阳神的崇拜者，他们所描绘的太阳神是以鸟与太阳为主题。”^[43]的结论与“三星堆人”太阳神鸟

崇拜得到旁证。

距今有 5800-5300 年的凌家滩文化也有许多与三星堆文化相同或相似的元素：

(1) 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发现在祭坛东部有用于祭祀活动的圆形石头建筑遗迹, 根据“只要发现比较多的石头出现在地层中, 下面大多都有墓葬。”^[44]的情况, 其功能与彝语把墓称之为[lu:bo] (积石冢) 一样, 圆形石头建筑遗迹是“凌家滩人”祖先的象征, 这就是彝族把墓说成积石冢的文化源头, 在彝族文化里祭坛就是祭祀祖先和日月神的地方, 其正如《发掘简报》所说: 这些“圆形石头建筑遗迹与祭坛有着密切的关联, 可能也是用于祭祀活动。祭坛是凌家滩遗址聚落最中心的祭祀遗存, 祭祀祖先等重大活动, 应在祭坛上举行。”^[44]

(2) 从“墓向大多为南北向, 头向朝南。”^[44,45]的情况来看, “凌家滩人”的祖先也许来自南方, 其与彝族《指路经》中的亡灵去向一致。

(3) 凌家滩遗址 07M23 墓口上放置雕凿的巨型玉猪, 在第三次发掘中也出土一件“鹰首两翅猪首”玉器^[45](如图 10②所示), 其上刻有一个“八角星”, 《第三次发掘简报》认为: “八角星内画一圆, 象征太阳, 代表太阳光芒四射, 八角星外画一大圆, 整个图纹可能象征宇宙之神或天地之神。”^[45], “把猪供献给太阳神, 祈保安康幸福、五谷丰登。”^[44]其实这个“八角星”就是三星堆三号坑出土的神坛上“⊗”的“图画文字”①的早期字符, 字义为“封”, 即“祭天”, 鹰眼用一玉璧装饰也表明了“苍璧礼天”之意。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里就有“筷子横眼睛这一代, 三岁的大肥猪, 抬它去献神。”^[46]所以, “鹰首两翅猪首”

玉器寓意为“鹰鸟载猪祀天”, 与高庙文化“鹰鸟载鱼祀天”寓意相同。在三星堆文化时期, 华夏民族祀天的方式又有了新的发展。八号祭祀坑中出土一具高耸的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人像 (K8⑨TQ: 121)^[1] (如图 11 所示), 我们现将其命名为“凤鸟人顶尊祀天”, 可以说其表达了青铜器时代“三星堆人”祀天的最高礼仪。何谓“凤鸟人”? 彝语为[hɔ: fi:], 汉语为“华胥氏”, 即生活在三门古湖周围的凤氏, 华夏民族的始祖“女祖” (战国后演化为“女娲”的原型), 其表明了三星堆文化从高庙文化、凌家滩文化的自然神飞跃到了人格神, “三星堆人”请女祖顶尊礼天, 表达了人间对天神的虔诚; 从前面所述的高庙文化“鹰鸟载鱼祀天”和凌家滩文化“鹰鸟载猪祀天”可知, “鸟”始终是人类与天神沟通的媒介和使者。高庙文化时期的渔猎时代人们只能用渔猎获得的鱼来祀天, 到了凌家滩文化时期的家畜饲养时代即可用饲养的肥猪祭天, 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青铜器时代人们可以用铜尊等向天施以酒礼。历史在向前, 社会在发展,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始终秉承着“天人合一”整体观念。

(4) 凌家滩遗址在第三次发掘中出土有玉人^[45] (如图 10③所示), 其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如出一辙, 笔者认为这是三星堆青铜人像来源的考古学证据, 凌家滩玉人所塑造的形象就是“正在向天祈祷的祖先神”, 也正是三星堆文化的精髓。

(5) 从凌家滩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中得知, 凌家滩遗址有大量的祭祀坑, 其内有草木灰、泥质灰陶豆、夹砂灰陶盆、禽骨等, 这是祭祀后燔燎的遗迹, 其与三星堆“祭祀——燔燎——捣毁——瘞埋”的祭祀方式如同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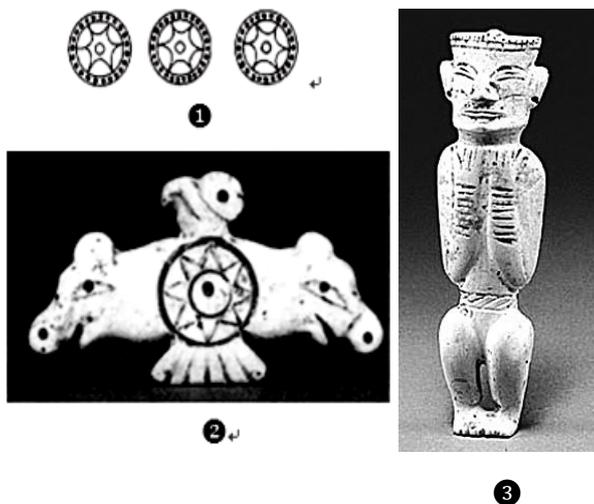


图 10 三星堆神坛上的“图画文字”①、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鹰首两翅猪首”玉器②和玉人③



图 11 三星堆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人像

图 12 金沙遗址祭祀遗迹（红烧土）（<https://archaeology.pku.edu.cn/info/1031/35465.htm> 截图）

（6）在第四次发掘中发现有分布范围近 3000 平方米红烧土块遗址，李新伟和赵辉两位学者认为“红烧土遗迹是一个台子的可能性很大。”^[47]众所周知，红烧土块是一种特殊的建筑材料，具有较好的防水功能。毫无疑问，“凌家滩人”既认知了红烧土块的这种物理特性，同时也会运用了“水与土和火”、“阳与阴”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因而用红烧土块建造了“驱灾禳福的台子”。红烧土块台子有三个功能：第一“水克火”

的“反咒”（用火烧过的土，称为“火土”，便成为了火反克水的材料，在彝族祭祀中常用）；第二“土克水”的“顺克”；第三以其红色的阳刚之气祛水之阴，雄伟高大的红烧土块台子以镇水患、驱水妖。在距今 9000 年前后的下汤遗址发现中心台地上有一面积约 100 平方米的用红烧土铺垫而成的祭祀广场，公元前 5290 年左右的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也发现有红烧土遗迹，其“平面形状呈直径为 2.3—3 米的近

圆形,中部有一个不规则的口大底小的圆形坑,直径 1-1.6 米、深 0.2 米。发掘时小坑内填满草木灰,并含有较多的陶片。”^[48]这些也许是凌家滩红烧土文化遗址的源头,也许凌家滩文化也受到了下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影响,不过也不排除红烧土文化源于旧石器时代用赤铁矿粉作为祭祀之物的文化传统。在三星堆 1 号、3 号、4 号、8 号和金沙遗址祭祀坑填土和灰烬堆积层中也有大量的红烧土块和红烧土颗粒(如图 12 所示),《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中认为“经火烧过的‘红砂石’(红烧土)碎块,即是浇铸铜器时用的泥芯。”^[3]但是根据下汤遗址、莪沟北岗遗址和凌家滩遗址等都发掘出红烧土块的情况来看,红烧土块的功用就是以镇水妖、消灾禳福,防护祭祀设施(包括祭祀坑、祭祀物品、祭坛、墓葬)免受水妖侵害,所以三星堆祭祀坑中的红烧土块(颗粒)也是起到“镇水患、驱水妖、护祭品”的作用。不过,在彝族文化里,用火烧过的土,称为[ni:tʃɔ:](尼充),[tʃɔ:]本意为“烧”,但又与“基因”的发音相同,便通常假借。在彝族文化里人是用黄土和白土做出来的,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有载:“造人的男神阿热,造人的女神阿咪,走到太阳下的黄土山,走到月亮下的白土山,黄泥做男人阿达米,白泥做女人野娃。蚂蚁瞎子这一代人,就这样造出来了。”^{[46]42-45}而且“太阳晒了七天七夜,泥人晒活了。”^{[46]44}经火烧过(在彝族文化里火烧和日晒同义)的红烧土又有了生命的象征,因而红烧土成为了表达“人类基因”赓续的载体,把它填充在房屋墙基里、用来建造构筑物、祭坛、撒铺在祭祀坑中或墓室中具有“世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寓意。裴李岗和凌家滩 M29 墓室填有红烧土颗粒、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用红烧土块构建,就是为了彰显华夏民族的“女祖”所具有的基因赓续能力。三星堆祭祀坑中的红烧土块(颗粒)出土,也证明了“三星堆人”与中原早期文化之间的“基因”关系,在祭祀坑中撒铺红烧土块(颗粒)就是为了“消灾解厄、护佑人民生生不息”,可以说用红烧土作为祭祀媒介是华夏民族祭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大汶口文化图纹中“饕餮纹”^[49]有了由“”的“图画文字”组成的图纹,其明显具有祭祀的功用。在壶或背壶上腹部、颈部有“”、“”图纹,在釜上有排列成圆形的“”图纹,这些“图画文字”在这里可能作为“文字”装饰,具有了抽象的“图语”意义。特别是壶或背壶上的“”、“”“图画文字”,其有“咒”^{[10]250}和“王”之意^{[10]336-337},以诅咒亡灵回归祖地路上的鬼神和彰显墓主的身份。我们又发现在安

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的陶器刻画符中^[50],有刻画符“”、“”、“”、“”、“”,这些图纹(或刻画符)是古彝文字,分别可释义为“诅咒”、“拜”^{[10]5}、“乾坤”、“界”^{[10]367}(指亡灵送往的天、地、人之间的界)、“悲伤”^{[10]320-321}。大汶口文化在大口尊、象牙梳、龟甲等器物上发现有丰富的“图画文字”,已经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了^[51,52]。

公元前 2200 年至前 1800 年之间的石峁遗址皇城台南护墙上和“夹道”中发现了 70 余件石雕,其中有“石雕神兽图”(如图 13①所示)^[53]。有学者认为“将以动物或神兽为主体图像的石雕砌筑于大台基护墙墙面上,彰显着建造者和使用者将‘有灵之物’的信仰观念与大台基有机结合的精神追求和现实意图。”^[54]显然,这些石雕镶嵌于墙体外侧和“夹道”中,应该说是给人(包括鬼神)看的,其具有驱鬼辟邪之功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件“石雕人面像”上古彝文字“”(洪水)、“”(祭祀)、“”(气、瀑^{[10]316-317},气势磅礴的瀑布一样)和“”(震耳^{[10]296},震耳欲聋的声音)的“图画文字”相当明显(如图 13①③④所示),兽的眼睛用“”,角用“”,头发用“”,嘴用“”充分展示了“洪水猛兽”的文化内涵,这对于居住在秃尾河、黄河岸边的“石峁人”来说在深受其害中认知了它的威力,所以石峁“石雕神兽图”是“石峁人”把自己的力量比作了“洪水猛兽”,以此来诅咒敌人或辟邪的,以保佑城民的安居乐业,这就像彝族的反咒文化一样。图 13 中④实际上是古彝文字“”(神,鬼)^{[10]340}的“图画文字”。

“石雕神兽图”左右还有一个“象纹”(如图 13②所示),象身上有古彝文字“象”的字符“”^{[10]435},其与高庙文化祭祀场的大象一样是“石峁人”的守护神,三星堆祭祀坑中大量的象牙也是用于驱赶、杀死水妖、护佑人民的祭祀品。石峁遗址出土有一件“双虎人头像”石雕(如图 13⑤所示),其生动地体现了“洪水猛兽”的原始文化。众所周知,石峁遗址南面有秃尾河,东面有黄河,还有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也许这里就是“洪水猛兽”这个典故的滥觞,三星堆“一首三虎”文化的源头。

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了“”的“图画文字”,如图 14 所示是二里头文化二期出土的铜牌饰(M4:5),学者张天恩认为:“这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55]这件铜牌饰中有两对“图画文字”“”和变形的“”,古彝文字为“鬼神”、“驱鬼”^{[10]435-437}和“咒”,因此这件铜牌饰是用于驱鬼避邪的护身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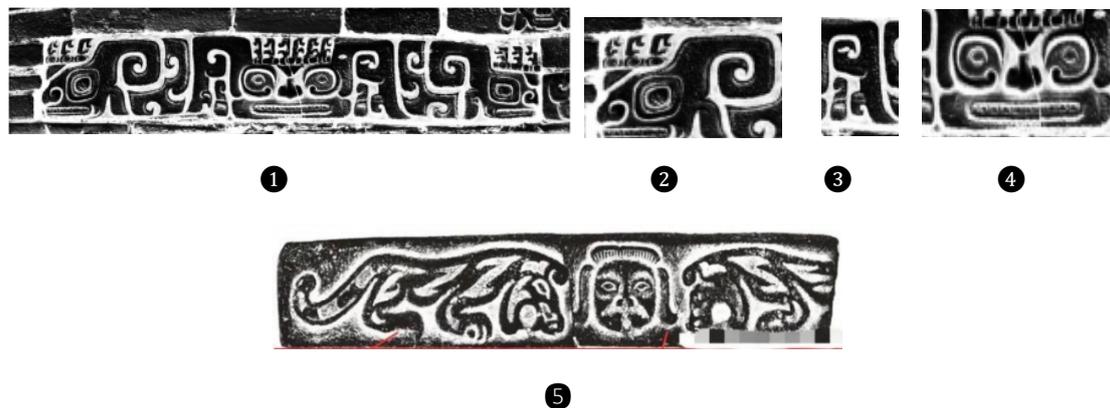


图 13 石峁遗址皇城台南护墙 11 号石雕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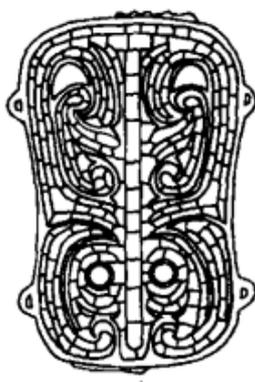


图 14 二里头铜牌饰



图 15 商代中期二里岗陶器和青铜器上的“图画文字”

到了商代中期的二里岗文化时期, 在其陶器和青铜器上就有许多与三星堆器物上一样的图纹, 如图 15 所示为二里岗陶器和青铜器上的图纹截图^[56], 这些图纹也是具有特定寓意的祭祀“河神”或“水神”的“图语”和“图画文字”, 说明“三星堆人”与中原二里岗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字承传的关系。殷商时期, 盛行铸造“龙虎铜尊”、“牛首饕餮纹铜尊”, 说明《山海经》所描绘的“洪水猛兽”文化已经在当时深入人心, 并成为了王朝祭祀的对象, 而且人们对“𠄎”、“𠄎”和“𠄎”、“𠄎”、“⊙”、“▷”、“𠄎”、“𠄎”和“⊙”的“图画文字”已经达到了尽人皆知的地步。

地处黄河岸边的保德县林遮峪墓葬出土的青铜鼎、罍、卤上的这些图纹更明显, 甚至在青铜甗上有与三星堆护身咒“▷”和“⊙”一样的图符(如图 16 所示)^[57]。这个图符并非是为了装饰, 而是寓意了这些青铜鼎、罍、卤和甗的祭祀黄河“河神”的功能, 难怪三星堆“尊和罍的风格具有显著的二里岗上层及殷墟一二期”的特点。^[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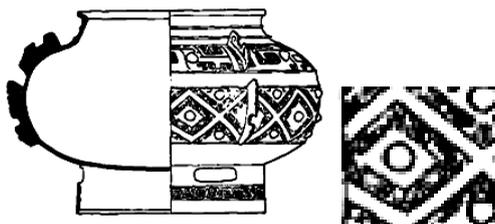


图 16 保德县林遮峪墓葬出土的青铜甗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八鸟四牛铜尊”图纹



湖北枣阳商代铜尊图纹

图 17 三星堆铜尊与湖北枣阳商代铜尊图纹

商代长江中游的祭祀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较大, 湖北枣阳和沙市商代铜尊^[59,60]上不仅有“𠄎”、“𠄎”和“𠄎”的“图画文字”, 而且有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八鸟四牛铜尊”上图纹如同一口的“𠄎”“图画文字”(如图 17 所示)。武汉盘龙城遗址杨家湾 M17 出土的铜带螭觚形器上的“兽首”, 用变形的“⊙”图画文字来点缀眼睛(如图 18 所示), 增强了祭祀禳灾的意图。

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的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出土的器物^[61]上也有许多与三星堆文化、大汶口文化相同或相近的“符咒”(如图 19 所示), 其具有明显的祭祀“物语”、“图语”和“图画文字”; 特别是从 M1 墓葬中出土的 2 件龟甲(腹甲), 其中标本(M1D1: 069)的龟甲, 背面右首甲前端有一未钻透甲板的小孔, 无卜辞, 与金沙出土的龟甲^[62]占卜形式相同, 有别于殷墟出土有卜辞的占卜形式。这些“物语”、“图语”、“图画文字”和龟甲占卜, 说明商代末期中国西部地区与三星堆——金沙的祭祀和占卜文化具有关联性。



图 18 商代武汉盘龙城遗址杨家湾 M17 出土的铜带鋹觚形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收藏）



铜车轸（M1:69） 玉兽面饰（M1D2:06） 衡饰（M1:5）

铜泡（M1D1:070） 铜泡（M1D1:090） 铜泡（M1:37）

图 19 陕西清涧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出土器物上的“图语”和“图画文字”

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联合组成的科研团队通过对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高山古城与青铜时代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人骨样本古 DNA 测序和群体遗传学分析证实：“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川滇先民主要源自黄河流域的粟黍人群，……现代中国西南藏缅人群（彝族是其中之一）保留着大量与高山古城、海门口古人相关的遗传成分。”^[63]而且黄河流域的粟黍人群向大西南的迁徙一直持续到商末周初，因此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图纹（包括图语、物语）和“图画文字”反映了河北尚义县四台和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字和文化、磁山文化的祭祀方式、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中

期“鸟啣鱼纹彩陶壶”的地震祭祀文化、高庙文化的祭祀方式和文字系统、良渚的太阳神鸟文化、凌家滩文化的祖先偶像和祭祀方式、东夷人的日月崇拜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文字、二里头的祭祀文化、夏后氏的“禘祭黄帝”文化、商代的青铜文化和二里岗的祭祀“图画文字”，“图语”、“物语”和“图画文字”在长达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进程中，连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信息交流与传递作用，完全可以确认“三星堆人（藏缅语族人群）”继承了华夏民族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字系统以及文化，难怪有学者指出：“藏缅语族人群是仰韶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之一，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的前身——磁山、裴李岗文化。”^[64]

4 余论

从前面三星堆器物上的“图语”和“图画文字”解读得知,“三星堆人”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主要是为地震和洪涝禳灾,说明地震和水灾是“三星堆人”最恐惧的自然灾害,比作了“洪水猛兽”。显然《山海经》不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神话,而是民间传说的辑本。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首三虎”和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八鸟四牛”图纹是“三星堆人”遭受地震和水灾把其比作“猛兽”的真实写照,也是《山海经》记载洪水与猛兽传闻的可考依据。

现在我们来考证三星堆文化时期到底有没有地震和水灾的问题。众所周知,三星堆处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沱江及其支流等形成的冲积扇重叠连缀而成的复合冲积扇平原之中,是洪涝灾害的重灾区。成都平原又地处龙门山推覆构造带与龙泉山褶断带之间,而这二个构造带则是地震多发区,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的地震^[65,66]。因此,黄明、马春梅、朱诚三位学者认为:“古洪水、古地震等自然灾害与古蜀文明发展的关系很密切,……成都平原灾变事件的研究多集中在古洪水和古地震方面。”^[67]

迄今为止,成都平原虽然发现了许多与洪水和治水有关的遗迹,但大多数古洪水的证据是在古河道内发现的,聚落中存在古洪水的证据较少,不过这不能证明三星堆和金沙文化时期没有遭到严重的水灾的情况。

《彝族源流》记载:“东方地陷,西方水涨,鸭头碰着天,蝌蚪天边游,六支叟厄人和八部武古人像松树下面的白菌子一般,被水淹死的尸首堆满地,填满谷,不见了踪迹。”^[68]这就是杜宇(笃慕)时期古蜀发生地震和水灾的真实记录^[69]。从《彝族源流》描述来看,三星堆和金沙居民区并非洪水冲击,而是被水淹没。极有可能四川盆地东边地震山体滑坡江口堵塞,四江汇入而入,造成了四川盆地的特大水灾。1986年3-6月,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和省文博部门合作在三星堆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三星堆文化层上的第7层有厚约20-50厘米洪水积淤沙泥,林向先生认为:“这么厚的沙层必然是长期被洪水浸泡的结果,故可以说是洪灾中断了三星堆古城文明,三星堆已经沦为荒郊野地。”^[70]杨奇等学者也经过在三星堆发掘发现^[71],三星堆土台南侧的壕沟里有三个阶段的沉积物形成过程:第1阶段沉积物靠近城墙,最先形成,厚度达1.7m;第2阶段沉积物整体位于生土层之上,厚度在1m左右,形成多个棕黄色粉——细砂和中——粗砂的互层,水动力较强,整个沿岸沉积的宽度达46m;第3阶段沉积物

厚度达1.9m以上。范念念等学者则提出:“发生于公元1099年的地震引起山崩、滑坡堵江,进而引起河流改道,这一系列变化是引起三星堆文明消亡与金沙文明兴起的原因,也是造成传说中古蜀国罕见大洪水的原因。”^[72]陈剑先生也认为《吕氏·春秋》卷六《制乐篇》所记载的“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群臣皆恐。”就是公元前1099年龙门山地震波及到周都城周原的情况写照^[73]。学者贾天骄通过对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以来地震与古洪水等事件环境考古研究也提出了“三星堆文化的衰落很可能与金堂峡地震,导致山体崩塌堵塞河道,排水不畅酿成洪灾,致使三星堆遗址遭受洪水侵袭有关。”^[66]的结论。因此,“三星堆人”深受地震灾害和水患,举行大规模的禳灾活动的证据有了祭祀遗物上的“图语”和“图画文字”可考的依据,也有了成都平原三星堆和金沙文化时期灾害研究成果以及发掘获得的洪水和湖相沉积物研究成果支撑,信而有征。

学者杭春晓在《青铜器饕餮纹研究述评》一文中有一问:“对祭祀如此虔诚的商人何要在祭器上大量重复地使用这种纹饰而不采用其它的形态呢?”^[74]我认为这一问问得好!问出了三星堆之谜至今无法解开的问题关键所在,商人也罢、“三星堆人”也罢,他们使用这些图纹是华夏民族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仰韶文化、高庙文化、良渚文化就开始产生,并经过长期发明、认知、共识和传承的结果,这些图纹不是为了修饰,而是具有特定寓意的“图语”或“图画文字”,甚至有些“图语”或“图画文字”至今还在使用,现在彝族民间还在使用距今1.5万年左右的柿子滩岩画文字“”、“”、“”和9000多年的河北尚义县四台出土的骨刻文字“”,称地震为“鸟啄鱼,鱼翻身。”如果从可考的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中期开始,这种文化已经承传了7000多年!良渚文化有了“”和“”的“图画文字”,说明“良渚人”在得到水的哺育和遭受水灾中产生了对水的敬畏。高庙文化有了“”、“”、“”、“”、“”等华夏文字,这些文字用到了4000多年后的三星堆文化时期,用到了7000年后的彝族现代社会之中,这种文字传播的时空特征,足以说明在距今一万以前就有了华夏文字,在距今7000年以前就形成了早期的文字系统。

从目前取得的考古情况得知: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期间,发生了多次古地震及其引发的洪灾^[75];在距今3650-2750aBP前后,洪水、山洪和地震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导致喇

家遗址的毁灭^[76]；据《中国新闻网》2023年01月05日报道^[77]：位于河南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双槐树遗址在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内至少有两次不同时段的地震，其中一次地震震级不小于6级。考古人员发现有多处地面沉陷、裂缝发育、崩塌、墙体倒歪和洪水痕迹，地震和洪水加速了“河洛古国”的衰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市薛村遗址也揭露出大量的古地震遗迹，古地震发生在商代前期，大致时间在二里岗下层晚期到二里岗上层之间^[78]；青海民和盆地在距今4900年左右也发生过古地震及暴雨山洪泥石流事件^[79]。中国史前遭受地震和洪灾、水灾的记载和考古成果不胜枚举，早在三星堆文化之前的这些地震和洪灾、水灾所形成的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三星堆等地出土的“一首三虎”和“八鸟四牛”的“图语”、“物语”以及众多的“图画文字”是中华民族对地震、洪灾、水灾的认识中产生的文化沉淀，是以“图语”和“图画文字”的形态记载的中华民族在与地震和洪涝灾害作斗争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性语言文字，结合图像语义与出土环境判断，其很可能具有禳除水灾的祭祀功能。

目前，三星堆祭祀的性质与目的仍无定论，本文运用古彝文字体系进行解读，采取了一种基于民族文字比较的解释方法，此观点仍需更多考古证据支持，期待未来能发现更具说服力的文字或符号，以便展开更深入的探讨与验证。

参考文献

-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24(4):21-42.
- [2] 段树乔.彝族历史文化视角下的三星堆文化[J].贵州工程技术应用学院学报,2024(04):23-35.
- [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J].文物,1987(10):1-20.
- [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J].文物,1989(5):1-27.
- [5] 龚新源,申子嫣.三星堆青铜器纹饰的艺术特征[J].大众文艺,2017(10):129.
- [6] 江伊莉,刘源(译).商代青铜器纹饰的象征意义与人兽变形[J].殷都学刊,2002(2):22-28.
- [7] 杨晓能.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J].文物,2005(6):72-81.
- [8] 郭秀.商代青铜器饕餮纹饰的解析[J].黑河学刊,2011(5):33+85.
- [9] 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89(3):305-323.
- [10]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滇南彝文字典[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172.
- [11]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研究[J].四川文物,1990(06):24-32+83.
- [12] 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J].文物,1959(01):2.
- [13] 石志廉.谈谈龙虎尊的几个问题[J].文物,1972(11):64-66.
-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J].文物,1983(03):51-61+99+103.
- [1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24(4):4-20.
- [16] 毕节市彝学研究会等.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8:160.
- [17] 袁德星.由礼地到通天——通天的管道[J].故宫文物月刊,1990.3:30-31.
-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七号坑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25(1):25-45.
- [19] 安家瑗.中国早期的铜铃[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00):37-40+61.
- [20] 邓玲玲.陶寺遗址陶铃功能探析[J].中原文物,2018(04):38-48.
- [21] 王继超.彝族神器铜铃及其历史文化信息承载属性探析[A].滇川黔桂四省(区)毗邻县第二届彝学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181-193.
- [22] 段树乔,郭震利.作为华夏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学人类学范式的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研究——兼论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形成[J].现代社会科学,2025(11):17-30.
- [23]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8(4):3-15.
- [24] 河北尚义四台遗址实证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现 [EB/OL]. http://news.cnhubei.com/content/2023-02/15/content_15486088.html.
- [25] Dandan Wang, Qinghai Xu, Yuanhao Sun, Shengrui Zhang. Centennial to multidecadal scales variability of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precipitation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Holocene.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45, 104692. <https://doi.org/10.1016/j.gloplacha.2025.104692>.

- [26] 殷春敏,邱维理,李容全.全新世华北平原古洪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2):280-284.
- [2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985.
- [28] 段树乔.从贾湖契刻符和磁山祭祀遗迹到三星堆“图画文字”探究三星堆文化的源头[J].现代社会科学,2025(5):21-34.
- [29] 汤池.试论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雕女神像[J].文物,1994(3):46-74.
-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2(04):3-6+115-116.
- [3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J].文物,1989(01):1-47.
- [32] 杨玉璋,张居中,蓝万里等.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2013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7(12):3-20.
- [3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0(4):6-25.
- [3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06(7):11-17+101-102.
- [35] 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等.湖南桂阳千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简报[J].湖南考古辑刊,2020(1):1-36.
- [36] 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J].文物,1992(3):79-87.
- [37] 梁丽君.良渚玉器兽面纹大眼的研究[J].文物春秋,2011(3):5-10+42.
- [38] 芮国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J].1988(01):34-53+104-106.
- [39] 张明华.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原因是洪水泛滥[J].江汉考古,1998(01):62-65.
- [40] 黄宜佩.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J].文物,1984(02):3-7+99-100.
- [41] 吴汝作.大汶口文化獠牙勾形器和象牙雕筒含意考释[J].东南文化,1988(1):12-15+72.
- [42] 吴汝祚.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关系[J].东南文化,1989(06):71-78+11.
- [43] 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J].考古,1992(10):53-61.
- [44] 张敬国.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J].考古,2008(03):2+9-19+99-105.
- [45] 张敬国.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J].考古,1999(11):2-13+98-100+102+104.
- [46]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阿细的先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103.
- [47] 马鞍山日报,含山县人民政府.凌家滩3000多平方米的红烧土堆积是什么[EB/OL].[2020-11-04],
https://www.sohu.com/a/429477324_251170.
- [48] 杨肇清.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河南文博通讯,1979(03):32-43+79-83.
- [49] 张云.大汶口文化的彩陶[J].南方文物,2007(3):彩版一、彩版四.
- [5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J].考古学报,2007(1):图版7-12.
- [51] 段树乔,郭宸利.基于彝族历史文化视角下的大汶口文化“字符”考释[J].现代社会科学,2024(3):57-65.
- [52] 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年代[A].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79.
- [53] 孙周勇,邵晶,邱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J].中原文物,2020(01):41-64.
- [54] 孙周勇,邵晶.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出土石雕研究[J].考古与文物,2020(4):40-48+63..
- [55] 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J].中原文物,2002(1):43-46.
- [56] 吴倩,魏青利,柏天然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初步勘探和发掘简报[J].中国国家博物馆,2011(10):23-32.
- [57] 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J].文物,1972(04):62-64.
- [58] 孙岩.三星堆出土青铜尊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含义[J].四川文物,2004(03):24-31.
- [59] 徐正国.湖北枣阳发现一件商代铜尊[J].文物,1990(06):59.
- [60] 彭锦华.沙市近郊出土的商代大型铜尊[J].江汉考古,1987(04):91-95.
- [6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4(2):44-69.
- [62] 孙杰.金沙遗址出土卜甲的修复[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3(1):75-81.
- [63] Le Tao,Haibing Yuan,Kongyang Zhu et.al. Ancient genomes reveal millet farming-related dermic diffusion from the Yellow River into southwest China. Current Biology,Vol.33 (22), 2023, pp.4995-5002.
- [64] 李辉.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的自然与文化人类学分析[J].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4(4):5-22.
- [65] 梁斌,朱兵,王全伟等.成都平原第四纪地质与环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58.
- [66] 贾天骄.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以来地震与古洪水等突发事件环境考古研究[D].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98-100.
- [67] 黄明,马春梅,朱诚.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环境考古研究进展[J].古地理学报,2017(6):1087-1098.
- [68] 王明贵,王显等.彝族源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54.
- [69] 段树乔.彝族阿细源流[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8:43-48.
- [70] 林向.从三星堆到金沙——寻找失落的三星堆古城[J].文史知识,2006(8):122~127.
- [71] 杨奇,向芳,冉宏林等.四川广汉三星堆土台壕沟沉积特征研究[J].古地理学报,2023(3):175-728.
- [72] 范念念,吴保生,刘乐.地震导致河流改道与古蜀文明的变迁[J].山地学报,2010(4):453-462.
- [73] 陈剑.先秦地震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对龙门山地区史前地震考古的启示[J].民族学刊,2013(04):41-59+119-122.
- [74] 杭春晓.青铜器饕餮纹研究述评[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1):95-111.
- [75] 张俊娜,夏正楷,王幼平等.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古环境分析[J].中原文物,2018(06):71-83.
- [76] 夏正楷,杨晓燕,叶茂林.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事件[J].科学通报,2003(11):94-98.
- [77] 王诗尧.郑州两处遗址发现古地震遗迹震级不小于 6 级[EB/OL].[2023-01-05],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23/01-05/9928369.shtml>.
- [78] 夏正楷,张小虎,楚小龙等.河南荥阳薛村商代前期(公元前 1500~1260 年)埋藏古地震遗迹的发现及其意义[J].科学通报,2009(12):106-112.
- [79] 郭永强,黄春长,周亚利等.民和盆地马厂塬遗址古地震与暴雨山洪泥石流事件光释光测年研究[J].地质学报,2016(01):191-201.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